

# 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 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

江柏煒\*

---

\*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mail: bowei@nqu.edu.tw

收稿日期：2012.04.16；接受刊登：2012.10.26

## 摘要

19至20世紀的金門歷經劇烈的歷史變遷，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人口遷徙。1840年代以後，大量青壯人口出洋謀生，其中東南亞各埠、日本長崎及神戶為主要的僑居地。人口的跨境流動對地方社會產生幾個層面的影響：一是部分累積財富的華僑除了贍養家眷外，亦挾其資本返鄉建屋以光耀門楣，且參與地方事務以貢獻桑梓；二是出洋人口多為男性，僑鄉社會性別比例不均，婦女「母代父職、妻代夫職」，角色吃重。1949年以後，金門成為兩岸熱戰、國際冷戰的軍事前線，大量軍隊進駐金門的結果：一是軍人消費經濟的興起，一改前期仰賴僑匯的支助；二是性別結構完全翻轉，成為一個以男性為主的封閉社會。

本文在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後期的金門為例，探究因人口流動所衍生之社會文化變遷。首先，分析在1840年代至1949年間金門做為僑鄉的歷史情境，包括男性人口外流、華僑商紳階層的興起、僑匯網絡的建立、僑鄉婦女的處境等。再者，探討1949-1992年間金門做為兩岸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戰地體制如何維持有效性、海外華僑網絡如何賡續、華僑如何代替地方社會發聲的史實，以及男性軍人移入所造成的性別結構不均所衍生的社會危機與對策等。最後進一步指出，20世紀的金門從人口流出、外來僑匯、開放流動的僑鄉變成人口流入、內需產業、封閉禁錮的戰地，其實是歷經了一種關乎人口遷徙、性別的社會文化變遷。

**關鍵詞：**華僑、移民、冷戰、性別研究

## 壹、問題意識：從人口遷徙及性別結構 重思地方社會的變遷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島、烈嶼（小金門）等島群所組成，坐落於臺灣海峽西側、廈門島東側，戰略地位重要。近世以來，海外移民十分普遍，金門成為閩南重要僑鄉之一。1949年以降，金門成為臺海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大量駐軍進入，一直到1992年11月7日才解除戰地政務。

在傳統的金門研究中，不論是1949年以前的僑鄉身分，或者是1949年以後的戰地角色，多數是以宏大敘事歷史（macro history）、國族立場的書寫方式。前者包括海外拓殖史、交通史、僑商貿易網絡的興起、華僑與辛亥革命、民族主義的關係、華僑政策演變等，或者討論僑居地華人社會不同方言群的互動、經濟結構、社區組織結構及其變遷、華人家庭與宗教生活等主題；<sup>1</sup>後者則是主要以軍方觀點、國族立場陳述戰爭事件，他們關心敵我雙方的戰略佈署及戰術應用，說明軍隊交戰細節及其影響，頌揚軍方如何建設金門之成果，進而宣揚反共意識與愛國主義。<sup>2</sup>此外，英文著作亦集中於金門在美國外交政策史、美中臺關係史，以及關於現實主義（realism）、軍事威嚇（deterrence）與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之研究。<sup>3</sup>

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典範轉移，一些學者不再侷限於國族、官方的視野，轉而關注地方史、微觀歷史（micro history）或不同歷史主體的史觀比較。以金門戰爭史來說，晚近出現四種主要趨勢：第一、雖仍以常規軍史研究的角度發問，但開始援引、比較海峽兩岸的文

- 1 重要著作包括：中村哲夫（2007）、王慶武（1994）、市川信愛（2001）、市川信愛、戴一峰主編（1994）、朱德蘭（1997）、李亦園（1985）、李盈慧（1997）、林孝勝（1995）、許雲樵（1977）、陳荊和（1963）、麥留芳（1985）、Kuah-Pearce（2000）、Yen（1995）。
- 2 代表著作如：國史館（1979, 1982）、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57）、許如中（1959）。
- 3 如：Accinelli（1996）、Chen（2001）、Li（2001）。

獻、檔案、報章，並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分析戰爭背後的決策過程；<sup>4</sup>第二、採擷與整理當年在金門服役的官兵之口述歷史；<sup>5</sup>第三、開始擺脫常規國族史、軍史的窠臼，從人類學與社會史的取向關注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文化變遷；<sup>6</sup>第四、以戰役遺產保存為目的之相關研究。<sup>7</sup>換言之，以地方社會為主體、連結微觀歷史與宏大敘事歷史的研究取向愈來愈受到重視。

同時，從人口遷徙及性別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深化對於地方社會的理解。常規地方社會研究或村落研究之研究路徑，往往指涉一種靜態的社會體系，特別是特定社群在一個有固定疆界的空間與地域之中，如何自我組織並與他人互動，與環境建立某種關係，以及如何進行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過程。然而，這樣的方法論不能解釋百餘年來跨境流動的金門僑鄉社群與男性為主的戰地社會形構。前者是在男性為主的海外移民過程中，地理上散居的家族如何維持經濟的夥同性，並以僑匯經濟模式支助家族、宗族或跨宗族的公共事務；後者則是歷經戰地體制的金門，大量男性移駐島嶼之內，因性別結構不均衍生不少社會危機，軍事治理如何加以調和的社會過程。當然，我們也必須討論在戰地體制下華僑網絡的賡續及其作用。

20世紀金門地方社會人口遷徙與性別結構的劇烈改變，對於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1949年以前海外移民主要以男性為主，而初期華僑擇姻娶親的對象又多以僑鄉女子為主。結婚之後，華僑再赴海外，而將婦女留在家鄉伺候公婆、照料田園家產，責任沉重。1949年國軍進駐金門，初期沒有餘力興建軍營，乃是佔住聚落民宅之內，與百姓生活空間領域高度重疊。性別結構不均的封閉戰地，倘若軍紀不彰，即有性暴力犯罪。於是，軍方於1951年設立了名為「特約茶室」的軍營妓院來因應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

4 如（中國）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2000）、田立仁（2007）。

5 如林文山等（2009）、孫弘鑫（2009）等。

6 包括（1）余光弘、魏捷茲主編（1994）；（2）Szonyi（2008）；（3）Chi（2004）；（4）江柏煒（2007）；（5）川島真（2008）、林正珍主編（2008）。

7 如（1）黃振良（2003）；（2）江柏煒、劉華嶽（2009）；（3）Zhang and Chiang（2009）。

是故，本文在地方史料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後期的金門為例，探究因人口流動及性別結構所衍生之社會文化變遷。首先，分析在1840年代至1949年間金門做為僑鄉的歷史情境，包括男性人口外流、華僑商紳階層的興起、僑匯網絡的建立、僑鄉婦女的處境等。再者，探討1949-1992年間金門做為兩岸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戰地體制如何維持有效性、海外華僑網絡如何賡續、華僑如何代替地方社會發聲的史實，以及男性軍人移入所造成的性別結構不均所衍生的社會危機與對策等。最後進一步指出，20世紀的金門從人口流出、外來僑匯、開放流動的僑鄉變成人口流入、內需產業、封閉禁錮的戰地，其實是歷經了一種關乎人口遷徙、性別的社會文化變遷。

由於研究視野及發問方式的轉移，本文的研究方法除了梳理官方檔案文獻外（如歷次官方編纂志書、國防部史政叢書、軍方《正氣中華日報》等），還大量運用民間史料與口述歷史（如《顯影》僑刊、<sup>8</sup>人物回憶錄、<sup>9</sup>口述訪談等），藉此理解大歷史下的個人生命故事，以及實地田野調查的佐證，包括海外金門僑社鄉團之調查、華僑或冷戰遺產等記錄，以深刻理解地方社會回應國族史、世界史的變動過程。

## 貳、近代海外移民與僑鄉社會的形成

### 一、跨境流動：近代金門的四次海外移民潮

金門人出洋並無確切文獻可考，地方志指為明隆慶、萬曆之後（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主編 1960），亦即1567年之後。從海外田野調

- 8 《顯影》創刊於民國17年（1928年）9月，為珠山薛氏宗族所辦之僑刊。經費多向南洋華僑及歸僑籌募。在資訊傳播不易的當時，《顯影》的發行，廣受南洋金門鄉僑歡迎。1937-1945年間，受到日軍佔領金門之故，一度停刊。1946年復刊，至1949年因國共戰爭爆發而停止。總計發行21卷、25冊。2006年，經江柏煒重編後，由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珠山薛氏宗親會出版。
- 9 如當時負責金門防務的司令官胡璉回憶錄、特約茶室管理員陳長慶回憶錄等。

查（馬六甲三寶山、長崎福濟寺等墓園<sup>10</sup>）來看，可證明16至18世紀中葉之間已有鄉人出洋謀生。不過19世紀中葉起，金門海外移民的規模更大，對鄉僑社會影響更加深遠。

近代以來，金門有過四次海外移民潮。第一次大規模南渡於1860年代，當時「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加上耕地不足、連年荒災所造成的經濟問題，迫使鄉民出洋。此外，1860年《北京條約》華工出洋合法化，以及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自1819年取得新加坡之後所採取的重商主義自由港政策，吸引了大批閩粵農村剩餘勞動力出洋謀生，就算「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仍然擋不住潮流。不過，一開始他們的本質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社群」（settling communities），這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Wang 1991）。

第二次在1912-1929年間，當時南洋殖民地經濟發達，吸引大批金門男性外出謀生。到了1929年間世界經濟大蕭條，白銀匯兌美金持續跌價，海外資金兌換當時仍以銀本位的國幣，相對有利，促使部分僑民結束產業返鄉。1930年代以後南渡潮略為減退的因素其實是受到英殖民政府政策之影響。1928年新加坡制定了《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來控制大量移民流入所帶來失業和經濟壓力。該條例在1930年起嚴格實施，當年8月1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6,016名，之後更逐年減少，到了1932年的後5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1,000名，而華人女性和12歲以下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Straits Settlements 1934）。

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1945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年10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1945年

10 筆者於馬六甲三寶山（Bukit China）找到年代最早的金門人墓園是1772年陳巽謀之墓；日本長崎福濟寺亦藏有數十座唐船貿易時代金門船員的墓碑，其中可辨識、年代最早者為1748年。

8月15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夫，紛紛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這一波的移民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

第四次則在1945-1949年間，國民政府一方面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一方面自南方省縣抽丁（徵兵）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持續外逃。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1954年九三砲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出地主要以臺灣本島為主。

從《顯影》僑刊可發現，近代金門鄉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如新加坡、馬來半島、北婆羅洲、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等地港埠，部分則散居日本、香港等地（江柏煒 2005）。另據1971年金門縣華僑協會的調查統計，以僑居新加坡人數最多，約5萬人左右；印尼及馬來半島次之，前者約25,000餘人，後者約24,000餘人；北婆羅洲及菲律賓則有5,000餘人（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主編 1971）。粗估起來，1970年代僑居海外的金僑約有11萬餘人。出洋人數超過當時本地人口數，顯見金門是一個向外移民的社會（an emigrant society）。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金門移民多數為自由移民，罕見契約勞工，移民地點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網絡。但這不代表海外金門人只是經商，也有相當一大部分是擔任勞動的工作，如1960年代以前活躍於新加坡河的舢舨業的估儷（苦力），他們曾組織高達34間的估儷間及1間總會館（金浯江，浯江公會前身），以照顧同鄉新僑。許多例子顯示，同鄉或同族僑居於同一地點，如烈嶼人多往汶萊、古寧頭李氏集中於新加坡與馬來半島的巴生埠（Klang, Selangor）、珠山薛氏僑居菲律賓依里岸（Iligan, Lanao）、安歧村人至泰國曼谷、水頭黃氏族人赴印尼峇里巴板（Balikpapan, Borneo）、山后王家齊赴日本神戶等。甚至，他們還從事相同或類似的行業，如新加坡的

九八行<sup>11</sup>及舢板業、巴生的木材業等。這種「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 機制不僅協助新客適應異地生活，也促成於海外建立以奉祀原鄉神祇、互助團結、聯絡鄉誼為宗旨的會館，對於重建社會文化網絡扮演了關鍵的作用(江柏煒 2010)(見圖1、圖2)。

## 二、僑匯經濟及海外會館的影響

僑匯，是海外華人匯款回鄉的簡稱。廣義的僑匯是包括一切捐輸回國的義款賑款，以及接濟僑眷的家用匯款。但早期多數依賴水客、民信局(批局)的匯款方式，不易精確統計僑匯數量。民國建立之後，才有較多的記錄。1949年以前，福建的民信局主要集中在廈門、泉州和福州等地，而以廈門數量最多。廈門的民信局涵蓋範圍包括廈門、金門、同安、晉江、南安等地。

民信局一般可分為經營一地業務的「專局」和經營許多地區的「雜局」兩種，並依業務分為頭盤、二盤、三盤等三種；直接在海外收信、獨立經營的海外信局，稱為頭盤局；接受各地海外信局所託，辦理轉駁中國內地信件的海外代理局為二盤局；受海外代理局委託，專營派送僑信的當地民信局為三盤局。以金門來說，僑民最多的新加坡設有頭盤局，透過香港中介，進入廈門為二盤局，金門本地則是三盤局(見圖3)。透過這個體系，在20世紀上半葉，華僑得以將海外所得匯回僑鄉。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出外，在鄉建業(興建住宅或購置田產)供族人居住或自己將來落葉歸根時居住之現象，十分普遍。而1920-1930年代是僑匯資金返鄉置產、建屋的高峰。僑匯經濟使得僑商影響力更加顯著，不但讓自己成為宗族內的商紳，也參與了跨宗族的公眾事務，包括修葺廟宇、造橋鋪路、興辦學堂、施藥濟貧、衛生改良、治

11 所謂九八行，基本上是一種批發土產貨物、徵收佣金代理的商號。由於佣金比例固定為2%，結算貨帳，一律九八扣交，故名九八行。土產主要由印尼進口，為樹膠、錫米、胡椒、咖啡、紅茶葉、豆蔻、黃豆、花生、辣椒乾、亞答等。早期的九八行，不僅為經營者帶來財富，更奠定了新加坡國際轉口貿易的樞紐地位。



圖1 新加坡金門會館（1919年舊照）

資料來源：新加坡金門會館提供。



圖2 馬來西亞巴生雪蘭莪金門會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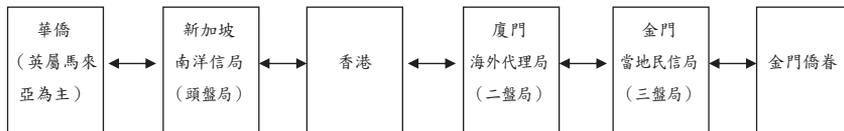


圖3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葉的僑匯網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安防禦等公益事業。近代以來，金門聚落發展多半受到僑匯經濟的挹注，如僑居神戶的王家創辦復興號，致富後匯錢返鄉興建山后中堡18間建築物，並分配給族人（江柏煒 2003）（見圖4）。一些重要的祠廟，俱有新加坡、汶萊、馬來半島、印尼群島各埠等僑商的捐獻，著名的例子之一為僑居汶萊的林德甫（1910-1999）、林明祥、明泰父子捐資修建烈嶼祠廟之事（江柏煒 2011）（見圖5）。

透過家產的購置與分配，海外僑商得以在遙遠的金門原鄉發揮影響力，實現了家族主義的古典理想；同時也藉由參與祠廟的捐建，重建社會網絡、提升了社會地位，更是當時僑商衣錦還鄉的社會實踐。

海外會館更積極影響地方公共事務，包括地方政治等。如金門之獨立設縣，即為海外鄉僑所發起。1913年，浯江孚濟廟<sup>12</sup>與金門公司<sup>13</sup>（新加坡金門會館前身）的第三任總理黃安基與副總理陳芳歲結



圖4 1876-1900年間完成的山后中堡18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 12 1870年一群南渡新加坡經商有成、祖籍金門的鄉賢倡議興建祠廟，做為聯絡鄉情、互助團結的會所。經過6年的籌備，1876年以「浯江孚濟廟」之名成立，擇牛車水士敏街（Smith St.）49號及51號二層雙進店屋，一樓中堂主祀分香自金門的聖侯恩主陳淵及其夫人神像，期能庇佑遠渡商旅；後殿供奉福德正神；樓上則預立鄉賢祿位，以配享祀。由李連排、黃英偉、楊振都、洪文聰、吳仲鍾、陳清泰（陳泰）、黃良川、黃超和等人出任大董事，李仕捷擔任首任大總理。1927年正式易名為新加坡金門會館（江柏煒 2010）。
- 13 早期所謂的「公司」（kongsi），並非是以營利目的的企業（company），而是指血緣或地緣社群內一種合夥的、公有的產業、財產或組織，在閩南地區已經非常普遍，也帶到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公司房、公司厝、估俚間等名詞，是當時南來者多數為單身漢，合夥租賃房間來居住，相互扶持、團結感情，進而形成一種較具制度的團體。



圖5 丕顯天猛公拿督林德甫（汶萊福建會館藏）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自汶萊福建會館。

合了金門本地商紳林乃斌等123人聯名電呈福建巡按使許世英，轉呈北洋政府內務部，以金門公司之名請願金門獨立設縣，1915年4月9日正式核准。又如，1920-1930年代不時傳出華僑宅第遭到洗劫之治安事件，僑眷生命及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除了個別僑商紛紛興建碉樓以禦盜匪之外，當時的金門縣政府竟發函請求新加坡金門會館支援。<sup>14</sup>海外會館替代了不少政府角色，維繫著僑鄉社會的正常運作。

1946-1949年前後，治安問題更加惡化，加上國共內戰的「抽丁」問題，致使華僑不敢返鄉，1948年2月新加坡金門會館發表〈告吾金父老書〉指出「外水強盜，攻家劫殺，僑眷還鄉，頻遭洗劫，慘案鉅災，層見疊出，致使久出僑商，或思歸退老，或欲在鄉建業，其青年子弟或想回國升學，或將返里結婚，率因盜劫及兵役二事，視故鄉為畏途」（江柏煒主編 2006）。<sup>15</sup>直言政府無能、反對抽丁政策、捍衛華僑權利是海外會館關心家鄉事務的具體表現。

- 14 1933年10月，縣長郭昌文發函給新加坡金門會館，提議《陸防辦法》八條以改善治安，內容包括：「1. 補充槍械；2. 建築碉樓；3. 裝置探海燈；4. 安設軍用電話；5. 組織守望隊；6. 擴充團警兵力；7. 分駐烈嶼；8. 分住大嶼」。其中第一條至第四條請求金門會館補助經費一萬六千二百元。金門會館旋即去函當時在鄉的僑領吳光枰、許允楫、蔡嘉種、陳景蘭、洪朝煥等人研究金門海防問題；至於陸防方面，經委員會討論認為海陸兼防應需要三萬七千餘元，另「籌募二萬五千元，以便購買一小輪船，並置械養兵，使其日夜巡檢金門海面」（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編者，〈星洲頌來佳音〉，《顯影》九卷四期，1933年12月）。
- 15 原始出處：《顯影》十九卷三期，1948年7月。

## 參、性別結構不均下的僑鄉婦女處境

### 一、人口外流下的僑鄉性別結構

僑鄉人口外流對地方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歷史上金門缺乏精確的人口統計資料。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在民國4年（1915年）設立縣治後，當時「總共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民國18年（1929年）第二次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金門縣政府 2009）。可以發現在1915-1929年間的14年內，金門人口減少41.45%，其中男性減少43.35%、女性減少39.06%，比例相當大。這段期間並無劇烈天災或戰亂，因此這些數據應可做為人口外流之佐證。金門不少族譜記載，初期出洋謀生者主要是男性，但無人口統計資料。若從金門出洋人數最多的新加坡來檢視，或可推估金門本地的情況。

1819年萊佛士爵士任命法夸爾（William Farquhar）為新加坡第一任參政司（Resident），他們及其後繼者實行的重商主義、自由放任的殖民政策，包括不收任何港口規費，擴大吸引新移民（如一開始即將新加坡開埠消息傳播到馬六甲，吸引華族生意人移居新加坡），提供自由貿易的利益與均等的商業機會，加強軍事控制以保證良好的航道安全，並進行都市規劃，闢築貫穿全島的道路，發展農業生產（最早是荳蔻的種植）等；同時隨著英國在馬來半島勢力的擴張，新加坡逐漸成為貨物、商賈的中心，來自中國與印度的移民也在此尋找機會；1869年聯繫歐、亞兩大洲的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蒸氣輪船的普及、國際通訊的便利、錫與橡膠工業的發展等條件，新加坡一躍而成區域貿易中心。

根據蘇瑞福（Saw Swee Hock）的研究，在新加坡成為殖民地後的頭二十年左右，馬來人是當時的主要族群。在1824年，馬來人有6,431人，占人口總數的60.2%，而華人有3,317人，占31.0%；1830年馬來人的比例降到45.9%，但是仍然高於華人的39.4%；到了1836年，馬來人人口（12,497人）被華人人人口（13,749人）超過。此後，新加坡的人口構成一直以華人為主（Saw 1999）。

進一步分析，在1824-1849年間短短25年間，新加坡人口成長了5倍，達到52,891人。其中，1824-1830年人口年均成長率為7.7%，1830-1840年達4.6%，1840-1849年為4.6%，創下新加坡人口統計史的最高水平。19世紀後半葉，新加坡人口成長不如早期那麼快。但還是在1901年達到226,842人，是半個世紀前的4倍。20世紀上半葉再次成長了4倍，達到1947年的938,144人。另外從統計中發現，在1819-1921年間，新加坡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出生人數，低出生率、高死亡率（早期瘧疾、霍亂、痢疾、肺結核等致命的熱帶傳染病猖獗及衛生條件惡劣）理應導致人口自然負成長。但大規模的移民不但抑制了人口自然負成長所導致的人口下降，反而到了1921年時，促使了人口成長率的大幅提升。自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由於熱帶傳染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性別比例的正常化也促使人口出生率緩慢而穩定地成長，人口出生率開始超過死亡率。到了1931-47年間，華人人人口成長模式發生改變，自然成長數量（175,500人）超過移民成長淨值（134,300人）（Saw 1999）。這裡面透露了兩個訊息：在1930年代以前移民是新加坡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而且多數是男性單身漢（未婚或已婚但配偶留在中國原鄉），造成人口出生率低。其他僑居地的情況也大致相同。由此反證，僑鄉的女性人口比例較高，應無疑義。

由於華人移民大量的流入帶來經濟壓力，1928年英殖民政府制定《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以控制移民數量。該條例實施於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之際。1930年8月1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6,016名，之後逐漸

減少，到了1932年的後5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1,000名。而華人女性和12歲以下的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Straits Settlements 1934）。1933年頒布《外僑條例》（Aliens Ordinance），新法令使政府能夠根據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需要來調節僑民的入口，但鼓勵女性家眷前來新加坡定居。為了緩和世界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失業情況，1938年5月1日起對華人女性亦實施配額限制（Straits Settlements 1935）。嚴格限制成年男性的配額制度一直持續到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新加坡之前。換言之，新加坡的中國移民數量在1930年代起受到管制，不過即使女性與兒童不在此限，多數苦力階層仍無能力將僑鄉妻兒帶至海外。

南洋其他僑居地的情況亦十分類似，以男性為主的海外移民將妻子留在家鄉的情況相當普遍，致使20世紀中葉以前的僑鄉社會性別結構已有失衡情況。

## 二、僑鄉婦女處境

擇姻娶妻是華僑回國的大事之一。早期華僑的婚姻仰賴原有社會網絡，常常由父母挑選或親友介紹僑鄉女子，返鄉迎娶。甚至是華僑家庭自幼互議結親。<sup>16</sup>一旦婚事完成，華僑再度隻身前往海外謀生，將妻子留在故鄉，替外出的丈夫恪盡孝道、料理家務。

16 列舉兩個例子說明之：（1）「里人永椿，月前自菲回來，本十二日遂即由其孀為媒，聘定後浦北門街楊搥之女清玉女士矣。查楊女士，年十六，現在金門公學畢業班肄業，且為該校高材生。結婚期間將在來月杪舉行云。」（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編者，〈鄉聞：椿婚聘定〉，《顯影》一卷，1929）；（2）「陳永福，珠浦鎮陳拱之子，去年剛從南洋僑商回來；蔡璇璣，浦北門蔡爾玉之女，為金門公學高級生，善戲劇，且嗜運動，一活潑之女生也。兩者自幼即由雙方家長互議訂婚，現即屆青春，結合正其時也……。」（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編者，〈鄉聞：宣佈同居〉，《顯影》二卷，1929。）不過，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一些自由戀愛風氣。有些在僑鄉已有對象的女孩，受父母之命必須嫁給華僑子弟，拆散了原本的感情。《顯影》文學作品中不乏講述這類故事。一般的印象認為華僑在經濟能力上比當地的青年好，多數父母願意將女兒許給他們。這些例子除了說明當年的愛情悲劇外，也反映了現代性與傳統禮教之間的抗衡。

由於僑鄉家庭成員分隔兩地，成為一種「分散家庭」（dispersed family）、「分散氏族」（dispersed clan）、甚至是「分散社群」（dispersed community）情況。亦即，家族成員地理上不住在一起，但經濟上仍有夥同關係，成員的權利義務仍然存在。同時，在男性缺席的傳統社會中，華僑家庭的媳婦角色更加多重與沉重。還有一種情況，富裕華僑家族會將海外出生或領養的成員送至家鄉，讓母親或妻子照顧，授與金門話、族規等，並薰陶以閩南風土民情，等到長到成年後，再送回僑居地承接家族事業。著名的例子就是僑居日本長崎的泰益號陳家，他們連續兩代將海外領養成員送回新頭村，交由孩子的祖母教養到成年後再返長崎（陳東華 2011）。這些均說明了華僑家庭的祖母或母親的責任。

另外，為了家族內部的運作，只要是育有數個男孩的華僑家庭，往往會留住一個男孩在鄉，協助年邁歸鄉的父親或丈夫不在僑鄉的母親，處理家族事務。這也說明與洋客結婚的婦女，除了婆婆之外，地位尚在大伯或小叔之下。我們常見資金寄返時經常不是直接匯給華僑的妻子，而是家族中的父母親或大伯、小叔，之後再由他們分配。閩南地區華僑家庭媳婦地位低微但壓力沉重。

「兩頭家庭」又是當時普遍的歷史現象。有些華僑會在海外另娶婚配，以便更快融入僑居地社會、擴大經商網絡，或者讓自己的海外生活有人照料；例如從事椰乾生意的菲律賓僑民往往迎娶當地婦女，以便可以獲得椰子園土地。這種同時在僑鄉已有元配、在僑居地再娶「番婆」（本地俗稱南洋的異族妻子）的情況，被稱為「兩頭家庭」。即使華僑仍然按時寄錢回家，但返鄉探視元配的次數不免減少，或是間隔時間愈來愈長。加上那些留在家鄉由母親扶養長大的孩子，成年後出洋承接家族事業，這使得母親更形孤單。而且不少案例顯示，兩頭家庭在男主人過世之後，分處兩地的配偶經常有分產糾紛，晚清至民國初年菲律賓宿霧經商致富的金門浦邊何仁慈家族即為一例。

也有夫妻長期分隔兩地，婚姻關係脆弱、進而衍生女性外遇問題的新聞。甚至，當時臺灣歌仔戲班在金門演出時大受歡迎，有些僑鄉婦女迷戀上戲班小生，衍生成社會問題，當時《顯影》主編澤人（薛健椿）即撰文直言批評。<sup>17</sup>即便有能力將妻眷接至外洋，共享天倫之樂，有時卻因經濟狀況不佳，必須將妻眷送返僑鄉，再度相隔兩地。<sup>18</sup>

僑鄉婦女的內心苦楚，大量顯露於僑刊文學創作中。《顯影》初期各卷刊載了不少女性書寫的詩，如〈閨怨〉、〈長相思〉（又名〔怨婦吟〕）等詩，道盡夫婿遠赴他鄉，獨守空閨的寂寞、無奈與哀怨之情。<sup>19</sup>其實不僅是僑鄉婦女，當時絕大多數隻身海外奮鬥的華僑，也得長期忍受親人離別、家庭破碎的痛苦，《顯影》一卷有首〈洋客苦〉的詩作，貼切地說明了這些因家庭貧窮、海外移民所產生的複雜感受。<sup>20</sup>這些因為移民散居所造成的時代悲劇，經常在不斷傳頌的成功出洋故事中被忽視或隱埋，僑鄉婦女的處境得以使我們從不同的主體重新書寫歷史。

## 肆、從流動到封閉：戰地社會的改造

二戰結束後，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愈發激烈，儘管在美國斡旋與調停下進行和談、簽訂協定，但雙方仍於1946年7月起爆發內

- 17 「浯島自往歲漫乎臺戲之表演，使島中婦女趨之若鶩，甚為迷亂顛狂，或贈物博歡，或受誘亂節，且呼戲女作契子，頗不乏人，嗚呼！」（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澤人，〈臺灣戲與金門婦女〉，《顯影》十一卷，1934）。
- 18 如「里人（薛）宗宗數年前攜眷往叻，近以南國商業冷淡，景況不佳，兼因外地家費殊浩，爰於月初促其妻及一養女歸國。」（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編者，〈珠山與浯島〉，《顯影》四卷，1931）。
- 19 〈閨怨〉：「寂寞深閨又一年，春花秋月不成眠，庭園荒蕪飄零盡，春夢迢迢到客邊」；〈長相思〉：「長相思。閨怨深。夫戍邊關絕書音。倚闌干。淚滿襟。惟中隻影單。香夢無處尋。對鏡憐瘦影。最苦閨中心。」（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思，〈文藝〉，《顯影》一卷，1929）。
- 20 〈洋客苦〉：「別鄉離井最愁腸，野店荒村當賤庸，鏡破梅妝辛苦甚，隴頭雲海只為窮。」（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照，〈文藝〉，《顯影》一卷，1928，頁104）。

戰。1949年4月，近百萬共軍渡長江，先後攻取南京、上海、武漢、長沙，並推進四川、廣西等。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成立。蔣介石令國民政府遷臺（薛化元主編 1990）。

1949年10月24日前夕，自潮汕移防、由司令官胡璉將軍所指揮的第十二兵團抵達金門，接掌金門防務。當日晚間，約二萬餘名共軍強行登陸金門西北隅的古寧頭，與國軍展開56小時的激戰（金門縣政府 2009）。國軍取得內戰以來少有的勝利，暫時止住了共軍「拿下金門、解放臺灣」的軍事行動，也讓國民政府得以喘息。1950年6月韓戰（Korean War）爆發後，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決定讓臺灣海峽「中立化」（neutralization）以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臺灣及中華民國攻擊中國大陸。先前未能解決的中國內戰問題開始國際化，進而成為更大尺度的全球冷戰（the Cold War）的一部分（Szonyi 2008）。

然而，臺灣海峽的中立化不保證金門獲得和平，戰爭持續發生，如1950年7月的「大膽戰役」、1954年的「九三戰役」（第一次臺海危機）、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第二次臺海危機）、1960年「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等。反共救國軍游擊隊也以金門為基地，三次突擊福建沿海島嶼，包括1952年元月「突擊湄洲島」、1952年10月「突擊南日島」、1953年7月「突擊東山島」等。1958年「八二三砲戰」之後，共軍對金門採取「單打雙不打」（單數日砲擊宣傳彈、雙數日停火）的象徵性武力威嚇。<sup>21</sup>

金門——這座昔日人員與資金流動的僑鄉島嶼——在20世紀的後半葉成為全世界知名的戰地。在軍事治理下，金門被改造為「三民主義模範縣」，在所謂「管、教、養、衛」的四大建設下，於政治、教化、經濟與軍事等層面創造了一種「軍事化的烏托邦現代主義」（a militarized utopian modernism）（Szonyi 2008）。進一步說，這是一種將軍事動員、社會控制、經濟建設、意識形態教化的統治術，並

21 「單打雙不打」一直持續到1978年12月15日美國與中國建交前才停止。

自我宣稱為理想性的、實驗性的現代性政治計畫，對內抗衡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對內壓抑反對聲音、減少政治阻力，以便有效掌控戰地等。

以女性動員為例，1950年代初在「全民武裝、全民動員、全民戰鬥」的號召下，先是以婦女教育班名義，進行識字教育及救護訓練為主的課程；教育班還安排有反共讀本的閱讀，以灌輸婦女政治意識。無故不到者罰款，且「學員教育期間，每一個月舉行月考一次」，訓練相關嚴格，且除非特殊情形，18-45歲女性均須參加。<sup>22</sup>1957年12月，國防部頒布《金馬地區各縣民防總隊編組辦法》，翌年4月調整「民防總隊」編組。女性依年齡與婚姻狀況，被納入婦女隊、預備隊、守備隊等不同角色的分組中；被選定為戰鬥村的聚落婦女，勤務更加吃重（見圖6至圖9）。<sup>23</sup>

戰地政務時期，媒體上再現了鬥志高昂、整齊劃一、紀律嚴明的女性民防自衛隊形象。1972年9月3日軍人節，男女自衛隊首度赴臺參加國軍運動大會之持槍遊行，10月再參加國慶舉牌遊行。翌年軍人節，300名女自衛隊員單獨托槍遊行。1974-1978年間的國慶閱兵大典，每年選派256-400名不等的男女隊員，施以嚴格訓練，赴臺參加國慶大典（金門縣政府 1992）。女自衛隊員經過精挑細選，外表

- 22 《婦女教育班入學規則》第一條明定：「教育班學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免參加。（一）有小孩未滿十八個月者。（二）獨負家庭生計者（以家中僅有婦女一人生產為限）。（三）懷孕三個月以上者。（四）身有暗疾或殘廢不能參加者。」（不著撰人，〈行署決定澈底實施，普及婦女教育，訂定入學規則通令實施〉，《正氣中華日報》，1951年4月14日第四版）。
- 23 1958年婦女隊以18-35歲體格健壯之婦女組成，執行宣導政令及公約、防諜、慰問及救護傷患、扶助老弱、管教兒童、輔助軍事勤務等工作；預備隊為16、17歲年輕女性，協助執行放哨、盤查、防諜、通訊、宣傳政令及公約等任務。1967年的民防指揮部組織中，17-35歲的婦女被編入婦女分隊，負責救護處理與政戰、心戰喊話任務；12-17歲與36-55歲之女性編成預備分隊，協助執行人員疏散、盤查、防諜、通信、政令宣導等任務。到了1968年設置戰鬥村，村中16至35歲未婚女性居民編組成守備隊，負責村落自衛戰鬥、反空降作戰、軍勤支援及匪俘看管等任務；18-45歲已婚婦女被編入勤務隊，負責戰鬥中擔任戰鬥心戰喊話、文宣與傷患救護等任務；12-15歲的年輕女性被編入幼獅隊，在戰鬥中擔任盤查、巡邏、交通管制、傳令等任務；其餘老弱婦孺則都編入疏散隊，在戰況發生時引導人員疏散避難（金門縣政府 1992）。



圖6 幼教老師射擊訓練

資料來源：《正氣中華日報》，1965年7月4日第二版。



圖7 金城鎮民防婦女中隊

資料來源：《正氣中華日報》，1963年10月10日第四版。



圖8 1970年代的心戰喊話訓練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胡璉將軍珍藏文物·照片類〉，編號E075，未出版。



圖9 1980年代初期的操槍訓練

資料來源：翁沂杰提供。

端正、身高至少158公分。透過全國電視節目的轉播，金門女自衛隊的軍事化形象，不僅是「戰地金門精神」的再現，也是強大「自由中國」的象徵（見圖10、圖11）。和前一歷史階段的僑鄉婦女角色相較，戰地婦女形象被連結了一種新的國族想像，通過總統府司令臺的金門女自衛隊托槍遊行成為一種愛國主義的文化儀式。

此外，戰地金門實施嚴密的戶籍管理，不僅是臺灣人赴金、金門人赴臺，還包括島內村落間的往返。郵件雖可遞送，但會面臨政治檢查；臺灣與金門之間的非軍用電話，也因國防安全理由而遲至1991年才開放。金門除了軍方所辦的《正氣中華日報》、《金門日報》及1980年代以後為了政治教化而設的「莒光日」電視節目等媒體外，幾乎與世隔絕（江柏煒 2007）。

華僑及其僑眷的出入境亦受到嚴格的管制。1953年，金門縣政府呈請福建省政府轉僑務委員會，邀請有關機關討論金門華僑與僑眷入出國簡化辦法，行政院核示：一、出境證有效時限從40天放寬到3個月；二、簡化流程，由僑務委員會直接寄給申請人；三、入出臺灣之證件，同時申請，同時核發。1955年3月福建省政府頒定《華僑入出境及僑眷出國簡化手續辦法》，出入境方面規定的改變是由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改為向「金門華僑協會」<sup>24</sup>申請，再由協會協助呈給省

24 金門華僑協會肇建於1947年6月，1949年暫停運作。1953年才又重新恢復。



圖10 自衛隊參加國慶遊行活動

資料來源：《正氣中華日報》，1972年10月16日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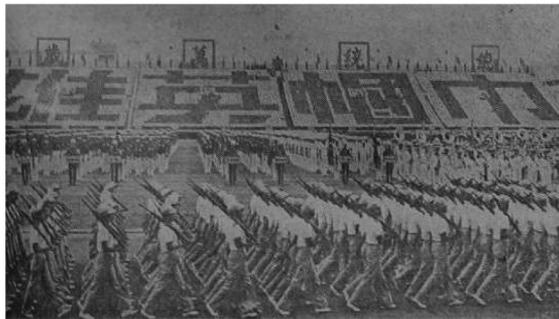


圖11 金門女自衛隊參加九三軍人節的隊伍

資料來源：《正氣中華日報》，1973年9月11日第二版。

政府、縣政府，辦理入境臨時身分證或出境申請文件。1956年10月之後，華僑協會的角色不再，改由鄉鎮公所轉呈，送達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後，由金門防衛司令部發給出境證或歸國僑胞登記證等文件（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主編 1971）。

在目前已知的資料中，僅有1958-1967年之間華僑返金的統計。每年返金人數從1958年的29人逐年增加到1967年的190人（見表1），但入境人數應該少於1949年以前的數目。出境人數並無官方統計資料，但從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等地金門籍新僑的訪談中，我們發現當時許多隻身在海外的金門青年，由金門、經臺北到東南亞，將

表1 歷年華僑返金人數統計表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Total
新加坡	14	17	25	31	43	59	85	104	73	129	580
菲律賓	4	5	7	6	8	8	13	12	13	14	90
馬來西亞	3	3	4	7	10	8	17	14	12	9	87
印尼	4	6	34	31	14	4		3	1	4	101
越南	2						2	2		4	10
泰國						1		2	4	2	9
北婆羅洲	2	7	10	11	19	21	45	34	27	22	198
緬甸							4	2	2	6	14
香港					1						1
合計	29	38	80	86	95	101	166	173	132	190	1,090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怡來（1971）。

妻兒接到僑居地，取得居留身分，以躲避戰爭的傷害。特別是1954年九三砲戰及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因為情勢高度緊張，形成再一次的移民潮。

儘管返鄉之路受到限制，但海外金門人對於故鄉遭逢戰爭變故，仍透過許多管道與家鄉聯繫，並要求軍方當局提供協助。如1950年1月30日《正氣中華日報》刊有菲律賓華僑慰勞團在臺灣拜訪胡璉將軍，關心僑匯中斷問題，並洽商開放金門香港航線報導。<sup>25</sup>此外1950年3月19日亦有一則報導，華僑代表向政府提出菲律賓、印尼等地的匯率，官方與黑市相差太大，造成循合法管道匯款的僑民損失嚴重，請求政府給予補貼等情事。<sup>26</sup>

- 25 一篇名為〈菲島僑胞慰問團，在臺訪問胡司令官，並洽請開放金門香港間航運〉：「菲律賓僑胞祖國將士慰勞團，……特往訪候金門某兵團司令官胡璉，對鄉邦近情曾詳加探詢，對於胡兵團防守金門，為祖國保全一片淨土，更代表僑胞致敬意，菲律賓僑胞對本鄉僑眷生活極為關切，過去僑眷生活係賴僑胞匯款接濟，福建戰事發生後，匯款即告中斷，僑眷生活極苦，慰勞團特代僑胞向胡司令官洽商，開放金門香港航線，使能有班船經常往來，便利海外僑胞出入，並使僑眷能得到接濟。……」（不著作者，《正氣中華日報》，1950年1月30日第一版）。
- 26 一篇名為〈本島歸僑擁護政府，決為反共抗俄艱苦奮鬥〉，實為菲律賓、英屬殖民地及印尼僑民對於匯率不佳，向行政公署反映此一問題（不著作者，《正氣中華日報》，1950年3月19日第四版）。

而1949年以後僑匯數量及僑匯網絡也發生改變。事實上，由於金門僑匯多為贍養家眷之款項，且透過民信局系統匯入，不容易精算。根據統計，1949年前金門每年的僑匯約在3,000萬元左右，1950年因戰事影響僅300萬元。1953年約1,500萬，1956年全年又掉到8,387,667元（許如中 1959）。與此同時，民信局大幅減少，1949年之後僅存5家（金門縣政府 1992）。當時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回憶「正是金門兵荒馬亂，攻守難測的時候」，幾個老人上吊輕生，「初以為是軍紀有關，下令徹查，結果是僑匯未到，無以為生，乃厭世自殺」（胡璉 1976），僑匯不通，造成民怨。1951年4月11日軍方的《正氣中華日報》亦報導金門商會舉行僑匯座談會，商議僑匯之溝通及解決僑信積壓問題，顯見經濟中斷的嚴重後果。

為了解決僑匯問題，胡璉將軍乃與美國「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合作，由「福建反共救國軍」出面，建立了非常特殊的僑信及僑匯管道。簡單地說，以福建反共救國軍的船隻至香港接收金門僑匯，並於該地採買物資運回金門；同時在金門成立粵華官兵消費合作社、發行粵華流通券，將香港採買回來的物資賣出後，發放僑眷家庭匯款，且盈餘尚能養活駐金軍人。<sup>27</sup>這是1950年代初期，遷臺國民政府自顧不暇、無力提供充裕物資給前線部隊，以及僑匯經濟中斷情勢下，胡璉治理金門戰地社會不得不採取的對策。1954年西方企業公司離開金門，福建反共救國軍終止活動；同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美援大量到來，金門防務所需之費用不需自給自足，上述的特殊僑匯通路停止。之後，僑匯改以臺灣銀

27 胡璉回憶錄提及：「負責與西方公司合作，代理福建反共救國軍總指揮的高級人員，找到了僑匯的空隙，利用接運香港游擊隊員的船隻，拿金門僑眷的信到港取得僑匯，就地買成金門日用必需品，隨船運回，再出賣給粵華物資供應社。如此，第一、僑眷們得到了比黑市還高的臺幣。第二、金門消費者得到了在臺北買不到的價廉物美的東西，如香煙洋酒口紅絲襪等。第四、游擊隊自然在其中獲取了一筆佣金，以作其經費的開支」（胡璉 1976）。

行匯兌方式進入金門，結束了自19世紀後期以來民信局網絡及其金融體系。<sup>28</sup>

其實，華僑因素是過去金門戰地社會史研究中沒有被探究的部分。進入戰地體制的金門僑鄉，國家以軍事威權高度控制地方社會，並依不同年齡層及性別加以動員，使之成為民防自衛隊，參與到兩岸對峙的國族對抗及世界冷戰的國際衝突之中。地方社會沒有發言權，被迫噤聲。但金門不是一般的地方社會，而擁有綿密海外網絡的僑鄉，儘管人員出入境及僑匯受到管制，但華僑善用了國民政府遷臺後所需要的政權正統性、華僑「四海來歸」之政治需要，透過每年的雙十國慶及十月廿一的華僑節受邀返臺，或與官方代表商議僑眷人身安全、僑匯匯兌等問題，或返回金門探親、考察後提出公共政策之異議（江柏煒 2009）。換言之，透過海外華僑向軍方當局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確保了僑眷家庭權益與僑鄉社會的集體利益。但是，海外華僑代替地方社會發聲，在國族主義的縫隙中找到一些空間，僅是一種微弱的抵抗，無法撼動軍事治理的絕對權威，不過，卻具體再現了1949-1992年之間國家（軍方）／地方社會／海外華僑三者之間特殊互動方式。

## 伍、戰地社會的性別與政治

### 一、戰地社會人口的性別結構及其課題

1956年，金門成為戰地之後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後每5年進行一次，統計則涵蓋烏坵鄉——位於閩中莆田湄州島外海的大坵及

28 1954年九三砲戰後，政府便以安全理由命令金門香港停航，僅存少數民信局（如三益、南僑、存德等）以非正式管道、小規模辦理海外與金門的結匯。有鑒於僑匯乃民生重要事務，福建省政府報請臺北以優惠辦法結匯，1956年獲行政院通過實施，此時華僑由當地銀行匯寄款項，透過臺灣銀行撥兌，時間上更較民信局快速，遂逐漸取代其業務。一開始規定僑眷1人每月可結匯美金100元，每增加1人，遞增50元；後逐年放寬（李怡來 1971）。

小坵兩座小島。1966年起，除人口數量、性別比例外，還有職業、役齡男女、學齡兒童、華僑及僑眷人數等調查。從人口統計來看，1966年以後人口緩慢增加，由56,842人，至1972年增至61,976人為高峰。之後，又因為青年學生就學、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就業，人口呈現外流至臺灣本島的現象。在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前，金門的人口尚不及1956年的總數，顯見社會發展之停滯（見表2）。

從數字來看，金門的性別比例與一般臺灣本島的非都會地區沒有顯著差異。然而，若計入常駐的軍人數目，便能凸顯性別比例不均的問題。以1950年來說，金門的兵力佈署以22兵團司令李良榮部隊為主力，分為金東、金西、烈嶼三個防區，「陸軍約八萬餘人、海軍艦艇九艘、空軍飛機二百餘架次」（金門縣政府 2009）。以8萬部隊計，併入居民人數，男性比例超過總定居人口八成以上。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藏有一份關於金門、馬祖的檔案，內容記載了當時國民政府軍隊有42,100人及游擊隊6,000人（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54）。這是目前已公開資料中記錄軍隊人數最精確的一份。據此計算，男性佔總定居人口的75.64%。1965-1980年代仍有4個守備師（超過4-6萬人）、1個本部預備隊的加強師（約2-4萬人）的佈署，人數估計也在6-10萬人以上。<sup>29</sup>簡言之在1980年代以前，計入軍隊的金門總定居人口，男性比例在75%上下。

進一步以15歲以上的男女人數且扣除已婚女性來計算，適婚年齡的性別比例更加懸殊。以1966年為例，15歲以上的總人口有27,109人，包括未婚男性3,728人、未婚女性1,688人、已婚男性8,651人、已婚女性9,353人（Szonyi 2008）。以當時8萬國軍計，每49.6名男性僅

29 1980年代中期以後，金門駐軍雖仍保留金東、金西、南雄、烈嶼等師之編制，但人數仍在55,000人左右。駐軍規模一直到1997年李登輝總統主政下推動國軍「精實案」後才大幅下降，僅剩25,000人。2007年11月金門取消旅級單位，兵力下修為1萬人（許紹軒 2009）。

表2 1956-1992年金門居住人口及性別比例（每五年）

年度	總計	現住人口		役齡男子 (16歲以上)	役齡女子 (16歲以上)	學齡兒童
		男 (比例%)	女 (比例%)			
1956	45,234	22,495 (49.73)	22,739 (50.27)	8,593	5,064	9,210
1961	47,528	24,248 (51.02)	23,280 (48.98)	8,643	5,140	8,572
1966	56,842	28,754 (50.59)	28,088 (49.41)	8,822	5,791	11,502
1971	61,305	30,794 (50.23)	30,511 (49.77)	8,717	5,807	13,335
1976	58,743	30,141 (51.31)	28,602 (48.69)	11,688	8,899	16,272
1981	50,248	26,047 (51.84)	24,201 (48.16)	12,112	7,357	13,034
1986	47,779	24,656 (51.60)	23,123 (48.40)	11,482	8,110	10,555
1991	43,442	22,506 (51.81)	20,936 (48.19)	11,238	5,362	10,189
1992	44,170	22,991 (52.05)	21,179 (47.95)	11,708	7,130	10,004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門縣政府主計室（2002）。

有1位可供婚姻對象的女性。儘管1955年之後實施「輪調制度」，<sup>30</sup>亦即駐紮外島及衛戍部隊原則上二年輪調本島一次（金門縣政府2009）。加上1949-1958年間，國軍主要定居於金門各聚落民宅之內。之後營房大規模興建，駐軍才遷出。在封閉的前線島嶼，如此失衡的性別比例所產生的緊張關係，以及擁有武力的軍人住進百姓的聚落之內，確實曾經造成一些社會問題。

進一步說，戰地政務時期曾發生過幾次嚴重的軍紀問題，鬧得地方上人心惶惶。如1953年一名受到部隊指導員長期壓迫的炊事兵錢金山被迫逃兵，潛入吳厝村、著名金門畫家李錫奇的家裡，在圍捕的過程中李氏祖母及姐姐遇害，該名炊事兵也舉槍自盡，事後軍方亦未善盡賠償之責，稱為「吳厝事件」。再者，亦有軍人之間為了追求當地女性而爭風吃醋，進而演變成情殺事件（呂靜怡 2008）。因早期的軍民混居所造成的軍人與地方婦女的感情糾紛，屢見不鮮，為了遏止這個問題，軍隊透過口語傳播「娶金門女性要續留本地當兵十年」這個根本不存在的規定。<sup>31</sup>此外，軍人性騷擾、性侵女童或婦女之事，時有所聞，雖然絕大多數消息被封鎖，但地方社會的口語傳播既廣又快，造成金門婦女對軍人的心理恐懼（周妙真 2007）。

勤務繁重、休假甚少、無法返臺探親、缺乏休閒娛樂、性壓抑（sexual repression）的軍旅生活，是造成軍紀失序及軍民關係緊張的導火線之一。即使軍方於1959年在成功陳景蘭洋樓及金湯公園設置了「官兵休假中心」，遴選表現優異的官兵放「榮譽假」，到這裡「休假」十天。但這種軍方所提供之制式的、樣板的休假中心，根本沒有離開軍隊的監視，更缺乏休閒娛樂的氛圍，在這裡「休假」一點也不輕鬆。

- 30 輪調制度表面上的理由是「平衡部隊作戰、訓練與勞役，並提高士氣，增強戰力」。但實際上是避免國軍派系化、地方化。
- 31 不過，這使得金門婦女在婚姻關係上多了一些選擇權，1980年代以前有不少婦女嫁給志願役士官，藉此改善個人及家庭經濟。加上近代以來普及於地方的「三八」婚姻制——男性必須付出「八」兩黃金、「八」百斤豬肉、「八」千元新臺幣做為聘金的風俗（魏光森 1962）。收入雖微薄但堪稱穩定的志願役軍人比起本地的農村青年更具擇偶上的經濟競爭力。

在這樣失衡性別結構下的戰地社會，軍方以提供官兵休閒娛樂與維護地方善良風俗之兩個不相關的理由，開始創辦軍營妓院。這就是「特約茶室」（又稱「軍樂園」或「八三一」<sup>32</sup>）設立之原因。

## 二、被控制的性歡愉（a controlled sexual pleasure）：「特約茶室」的出現

事實上，在1930年代金門已有妓館，不過是民間私辦的性產業，是當時富裕的僑鄉社會的娛樂生活，而非官方經營。<sup>33</sup>軍方主導的特約茶室，目標是舒緩軍人性壓抑所衍生的相關問題，避免危及軍隊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這種官營的特約茶室與日本在1930-1940年代發動戰爭時期所成立的隨軍慰安所，有類似的功能，俱為抑制軍人性侵婦女的罪行。<sup>34</sup>不同的是招募的對象及其影響，日軍慰安涉及了殖民國家暴力與殖民地女性之間的複雜權力關係，而金門特約茶室的女子（侍應生）是招募自臺灣本島，且從目前揭露的檔案來看，沒有顯示侍應生受到國家的脅迫；但因特約茶室位於城鎮、聚落之內，且時間自1951年10月16日成立起至1990年11月30日被國防部勒令停業為止，長達39年之久，對地方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衝擊。

1951年10月16日金門金城「仁武特約茶室」開幕，隸屬金防部政五組管理，並派憲兵維持秩序。1954年起，金門本島的庵前、成功（陳坑）、小徑、山外、沙美（初設於東蕭）及烈嶼的青岐、后宅、東林等陸續成立特約茶室，另設有安歧機動茶室及外島（大膽）巡迴服務站（見圖12、圖13）。其中，金城為總室、庵前為軍官專用。一

32 「八三一」則據信為仁武特約茶室所屬電話分機為831而得名。

33 《顯影》第七卷第三期有一則「妓館增添」的報導，提供我們一探當時的性產業與城鎮娛樂生活，「後浦之妓館，除水嫂、目豬仔二處外，再也找不到第三處了。近有福州人因鑿外來謀生者日多，妓館遂即有應接不暇之勢，自以為此途應時勢所鍾，喜為發財的絕好機會，遂於前日由福州配到新的貨色幾種，當在新街開張，現正供人日夜賞玩……」（江柏煒主編 2006；原始出處：編者，〈妓館增添〉，《顯影》七卷三期，1932）。

34 可參考朱德蘭（2009）。



圖12 庵前特約茶室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胡璉將軍珍藏文物〉，照片類：編號E074，未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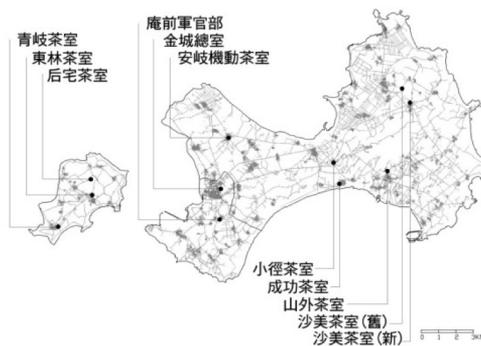


圖13 金門特約茶室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開始特約茶室由軍方主導，並無法源依據。因為沒有建立制度，主事者及經營者的權力很大，經常發生白吃白喝白嫖、經費浮報濫用、帳目記載不實等問題（陳長慶 2005）。直到1960年《臺灣省各縣市娼妓管理辦法》公布實施後，1968年軍方才根據母法制定了《特約茶室管理規則》，杜絕承包商及軍方人員的勾結與濫權。<sup>35</sup>

35 金防部1968年訂定相關規定，「劃分特約茶室等級，釐定員工編制，修訂管理幹部職稱，提高管理幹部素質，嚴加考核，裁減冗員，嚴禁管理幹部利用職權白吃、白喝、白嫖，以及員工生賭博、召會、借貸等不法情事發生，違者，員工解雇，侍應生遣送返臺」（特約茶室管理規則（57）才幹字第一三九一號函。9月30日）。

特約茶室分為甲乙丙三級，根據其組織編制，推估金門每年至少有120位侍應生。侍應生由臺北招募站招募，為自願應徵而來的，並須符合18至30歲之間、無婚姻或家庭糾紛、身體健康、沒有犯罪紀錄等條件（陳長慶 2005）。軍方制定了許多侍應生的管理規定，如定期健康檢查、嚴禁外宿、賭博及酗酒、不准私裝電話、嚴禁私下與官兵、公務人員及民眾約會或發生錢財糾紛、嚴禁詢問軍事機密與探聽公務軍情，且首次來金滿半年才能請假。考核標準亦嚴，其中每月票房未300張、連續3個月者，即遭遣送返臺。經費方面，70%為侍應生所得，30%為承包商所得，食宿由承包商供應（金防部 1968）。除軍人外，一般民眾不能進入特約茶室。茶室亦根據軍人階級分為校級、尉級、士官兵三種，票價有所不同。1971年開放無眷公務員可以進入庵前茶室，「以調劑生活而維護地方善良風俗」（金門縣政府 1971）。

由於特約茶室需要較大的土地面積，也需要交通便利、方便找到之處，故多坐落於城鎮或重要聚落邊緣，而這些地方往往就是城鎮或聚落的學校、宮廟所在的附近。但軍方盡力隔離居民與侍應生兩者。侍應生除非就醫，一般不能隨便外出；缺少日用品時，亦請茶室工友或洗衣婦代為購買，僅有年節假日才會分批外出到廟裡拜拜，或者到鎮上添購新衣、化妝品等。平日與居民互動很少。儘管如此低調，她們難免還是受到保守民眾的指指點點。

對民風保守的地方社會來說，特約茶室的出現存在著一種矛盾、兩難的心態。居民以道德的觀點認為茶室違背了善良風俗（與軍方設立宗旨恰恰相反），且多數特約茶室就與祠廟、學校比鄰而居（如庵前特約茶室位於孚濟廟旁、金城總室位於朱子祠、基督教會堂及中正國小後方），對百姓的心理衝擊甚大。但又擔心它的消失，影響地方治安。<sup>36</sup>

36 1991年金門縣諮詢代表會提案說明「查近數月來，金城等地區發生數起軍人強姦婦女案，已造成地區家庭及個人之傷害」。「為確保公共安寧秩序，維護善良風俗，促請政府專案研擬娼妓管理辦法取代軍中樂園『八三一』，以保障婦女安全」（金門縣縣政諮詢代表會 1991）。

然而，國家刻意放大了特約茶室正面的社會功能。特約茶室有時不但沒有化解婦女的身心恐懼感，反而令打扮時髦的婦女被誤會是侍應生而橫生困擾。同時，特約茶室與維護善良風俗根本無關，它的存在令地方社會尷尬不已。例如庵前茶室緊鄰奉祀開悟恩主陳淵的孚濟廟，每年農曆2月初2的神誕日陳氏族老必定要求它歇業一天，以免影響祭祀；園區內還留有陳氏祖墳，只有清明節才允許後人進入掃墓，居民私下有所抱怨。這些情況反映了特約茶室與地方社會經常處於一種緊張、對立的複雜關係。

侍應生的社經地位相當卑微，流動率又高，與地方社會格格不入，是一個被剝削的、無言的邊緣性社群。她們的生活環境被侷限於狹小的特約茶室內，如同軍隊一般受到嚴格管理，一旦未達高標準的業績，即遭遣送返臺。但她們的工作又被視為愛國的表現，小徑特約茶室門口有幅對聯：「大丈夫效命疆場，小女子獻身報國」，即以一種雙關語（couplet）再現了她們身處前線的角色，意味著她們的身體不僅提供給軍人，更奉獻給整個國家。

「愛國妓女」有時是國家賦予她們的形象。1957年〈風塵俠女黃秀琴〉的報導即為一例。一為來自臺北、時年28歲、家境困苦、讀書不多的侍應生破獲了匪諜的故事。<sup>37</sup>侍應生的行為，被軍方宣傳成一種愛國不分貴賤的樣板。這樣的報導並非孤例，1959年臺灣發生「八七水災」，特約茶室員工及侍應生集資捐款八千元賑災，亦獲得表揚（正氣中華日報 1959）。

簡言之，特約茶室是一種關乎性別及政治的策略運用，它為軍隊可能對地方社會產生的性暴力，扮演了調節器的功能，但也產生了新的文化衝突。但這個場所不是肆意放縱的「軍樂園」，而是一個被嚴

37 「以責任、勇毅與無比機智，協助憲兵擄獲匪諜XX，替國家立了大功，獲得政府頒給獎金一千元，更贏得萬千軍民一致的崇敬。」她表示，「目前的環境乃是情非得已，希望家庭經濟情況稍有好轉，當即改行從良。好在自由中國的臺灣沒有一個餓死的冤魂。我們可以想見她善良的本性與對國家的樂觀和信任。」（夏裕民 1957）。

格控制及管理的特殊機構。侍應生處於社經地位的最底層，被國家所控制與剝削，沒有發言權與自我詮釋權，僅存國家所賦予的愛國的單一形象。不過，特約茶室及其侍應生真實存在於前線，卻不被地方社會所接受。特約茶室也非如國家或經營業者所宣稱那樣扮演了偉大的功能，而是戰地社會最隱晦、最尷尬的一種機制。

## 陸、重繪地方社會形貌：人口遷徙及性別結構變遷下的金門

金門現代史歷經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情境，且以1949年為分水嶺，前後期是以截然相反的模式：1949年以前大量男性移出，僑匯經濟影響普及，僑鄉婦女角色多重；1949年以後則是大量男性移入，軍人消費經濟出現，性別成為必須面對的政治與社會課題。從人口遷徙及性別結構出發，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一個相對封閉、人口規模不大的島嶼地方社會之變遷，以及做為連結地方史（微觀歷史）、國族史、全球史（宏大敘事歷史）的討論案例。

通過這樣的視野下，金門的僑鄉歷史不會只是光宗耀祖、返鄉建業的僑商成就之單一書寫，戰地政務更不會是「軍民一家」的官方宣傳或愛國主義式的敵我意識之強調，而是能夠藉由人口遷徙與性別結構的檢視，以一種動態的歷史過程，重繪地方社會的形貌。

進一步說，在20世紀中葉以前，跨境移民至東南亞、日本各埠的金僑，一方面將其海外所得匯回故鄉贍養家眷，部分致富者對祠廟興修、教育事業籌辦、實業建設等公共事務多有捐輸，且對地方政治多有批評，並移植及轉化南洋殖民建築為主的物質文明建造了至少超過161幢的洋樓，促成了一種「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從家族主義到公共領域過渡的公民社會建構，以及透過混雜建築文化形式做為凸顯新興地位、財富力量與進步意象的象徵（江柏煒2011）；但是，僑鄉社會的婚姻網絡又與洋客相關，僑鄉性別結構失

衡，女性往往被留在家鄉，且因夫婿缺席而使得角色更為多重；當然，尚有兩頭家庭的挑戰與壓力。這種既具現代性雛型又受到傳統性別文化高度制約的兩種矛盾情境，是僑鄉庶民社會的歷史真實。

但戲劇性地是，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男性人口比例居絕大多數的戰地社會。海外網絡不似從前，僑匯經濟大幅減少，萌芽的公民社會受到軍事治理的壓抑。軍人消費經濟取代了僑匯，成為百姓家戶仰賴的收入來源。但懸殊的性別比例，倘若軍紀不彰，確實造成婦女人身安全及心理恐懼，有可能擴大為軍民衝突或糾紛。在這種情況下，特約茶室的設立成為軍方關乎性別的政治學策略運用。換言之，國家在「管、教、養、衛」的戰地政務目標外，仍必須考慮性別議題，藉以維持戰地社會的穩定及統治的有效性。

20世紀的金門，從人口流出、外來僑匯、開放流動的僑鄉變成人口流入、內需產業、封閉禁錮的戰地，歷經了一種關於性別與政治的社會文化變遷。這種研究視角的轉移，有助於我們深化金門現代史的研究，且進一步理解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 謝誌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身體規訓、性產業與空間：戰地金門的「特約茶室」（八三一）（1954-1990）」（95-2415-H-507-001-）及「『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的華僑影響及其物質文化變遷」（99-2410-H-507-003-）研究成果之一部分。此外，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給予的批評指正及修訂意見。惟文章若有謬誤之處，仍由作者負責。

## 參考文獻

- 川島真（2008）金門的軍事基地化與僑鄉因素的變遷：1949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楊加順主編，2008金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烽火僑鄉敘事記憶：戰地、島嶼、移民與文化，頁207-220。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 中村哲夫（2007）華僑商號「泰益號文書」に基づく神戸華僑の歴史研究。神戸：神戸學院大學人文學部。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田立仁（2007）金門之熊：國軍裝甲兵金門保衛戰史。臺北：大河文化。
- 市川信愛（2001）金門華僑のネットワーク——金門出身旅日華僑の僑郷社会分析。九州：九州國際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
- 市川信愛、戴一峰主編（1994）近代旅日華僑與東亞沿海地區交易圈：長崎華商「泰益號」文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
- 本島歸僑擁護政府，決為反共抗俄艱苦奮鬥。正氣中華日報，1950年3月19日第四版。
- 行署決定澈底實施，普及婦女教育，訂定入學規則適令實施。正氣中華日報，1951年4月14日第四版。
- 朱德蘭（1997）長崎華商貿易の史的研究。東京：芙蓉書房。
- 朱德蘭（2009）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
- 江柏煒（2003）晚清時期的華僑家族及其僑資聚落：福建金門山后王氏中堡之案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5(1): 1-57。
- 江柏煒（2005）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17(1): 159-216。
- 江柏煒主編（2006）顯影（21卷25冊）。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珠山薛氏宗親會。

- 江柏煒（2007）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 85-155。
- 江柏煒（2009）軍事治理下的地方社會：以金門華僑網絡為中心之考察（1949-1970s）。考古人類學刊，71: 7-46。
- 江柏煒（2010）星洲浯民：新加坡金門人的宗鄉會館。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 江柏煒（2011）混雜的現代性：近代金門地方社會的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民俗曲藝，174: 185-257。
- 江柏煒、劉華嶽（2009）金門「世界冷戰紀念地」：軍事地景的保存與活化芻議。江柏煒、劉華嶽、林美吟主編，2008年金門都市計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77-124。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 呂靜怡（2008）「出操」的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的生命經驗敘說（1949-1992年）。慈濟大學人類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光弘、魏捷茲（James R. Wilkerson）主編（1994）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沈衛平原著、劉文孝補校（2000）金門大戰：臺海風雲之歷史重演。臺北：中國之翼。
- 李亦園（1985）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入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 李怡來（1971）金門華僑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
- 李盈慧（1997）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臺北：國史館。
- 周妙真（2007）官方影像中的金門戰地婦女形象（1949-1978）。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孝勝（1995）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林文山、劉國傳、查台傳（2009）古寧頭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 林正珍主編（2008）2008年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7-220。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 金防部（1968）特約茶室管理規則（57）才幹字第一三九一號函。9月30日。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主編（1960）金門華僑志。金門。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主編（1971）金門縣志。金門。
- 金門縣政府（1971）（60）造民字第五五八三號函。4月12日。
- 金門縣政府（1992）金門縣志。金門。
- 金門縣政府（2009）金門縣志續修。金門。
- 金門縣政府主計室（2002）金門縣統計年報第四十九期。金門。
- 金門縣縣政諮詢代表會（1991）81諮議字第三九三號。10月20日。
- 胡璉（1976）金門憶舊。臺北：黎明文化。
- 「茶」與同情，特約茶室員生熱忱捐獻八千元賑災。正氣中華日報，1959年8月17日。
- 孫弘鑫（2009）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夏裕民（1957）風塵俠女黃秀琴。正氣中華日報，1月21日。
- 國史館（1979）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
- 國史館（1982）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1957）金門戰役。臺北。
- 許如中（1959）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
- 許紹軒（2009）金門駐軍，最多時高達十七萬。自由時報，6月3日。
- 許雲樵（1977）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見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主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頁507-549。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
- 陳東華（2011）近代長崎華僑社會和福建商人。見江柏煒主編，福建省金馬歷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9-62。金門：福建省政府。
- 陳長慶（2005）時光已走遠。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 陳荊和（1963）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菲僑胞慰問團，在臺訪問胡司令官，並洽請開放金門香港間航運。正氣中華日報，1950年1月30日第一版。
- 黃振良（2003）金門戰役史蹟。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 薛化元主編（1990）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1945-1965）。臺北：業強。
- 魏光森（1962）金門「三八」婚姻制。正氣中華日報，3月8日。
- Accinelli, R. 1996.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54. "The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IA-RDP80R01443R000300050008-7, National Archives, USA.
- Chen, J. 2001.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Chi, C. H. 2004. "Militarization on Quemoy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ist Hegemony, 1949-1992." Pp. 523-544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Ecology of Quemoy*, edited by C. K. Wang. Taipei: Shih Ho-Cheng Folk Culture Foundation.
- Kuah-Pearce, K. E. 2000.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Aldershot, UK: Ashgate.
- Li, G. 2001.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1950s: Chinese Strategy and Tactics." Pp. 141-172 in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edited by R. S. Ross and C. Ji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Saw, S. H. 1999.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traits Settlements. 1934.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 Straits Settlements. 1935.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 Szonyi, M. 2008.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 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Yen, C. H. 1995.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Zhang, J. J. and B. W. Chiang. 2009. “‘Normandy’ or ‘Las Vegas’? Positioning ‘Kinmen’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ra.” Pp. 189-230 in *200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Urban Planning, Quemoy (Kinmen)*, edited by B. W. Chiang. Kinmen: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 Population Movement, Gender Structure and Social-Cultur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Quemoy

Bo-Wei Chiang\*

## Abstract

Quemoy (Kinmen) is an island close to Quanzhou (Zaitun) and Xiamen (Amoy) port. A large number of its residents im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Nagasaki and Kobe in Japan in search of a living after the 1860s. After they eventually accumulated wealth, these transnational overseas Chinese brought their capital back to Quemoy to participate in family, clan or public affairs. In addition, the gend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Quemoy became unbalanced, so women played a major role in local society. After 1949, Quemoy became a battlefield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CP, as well as the frontline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ld War blocs. Under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lineages was suppressed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living abroad were severed. For forty-three long years, until 1992, Quemoy was transformed from an open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a closed battlefield and forbidden zone.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cultural change and population flow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Quemoy. First, I will analyze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the society there, including emigration of

---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of Hokkien (South Min),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E-mail: bowei@nqu.edu.tw

Received: April 16, 2012; accepted: October 26, 2012.

its young men, the rise of an overseas merchant-gentry class, economics of remittance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women's life histories etc. Secondly, I deal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of Quemoy as a battlefield, including immigration of soldiers, the impact of military governance, the influence of soldiers' consumption, and the social crisis due to the gender imbalance and the military authority's response. Finally, I will generalize from two different social-cultural changes for population flow an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Quemoy.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migration, cold war, gender studies***